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镠 主编

青铜器卷

吴伟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罍卷

吴 伟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罍卷 / 张懋镛主编; 吴伟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03-046615-0

I. ①中… II. ①张… ②吴…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5405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曹 伟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3/4

字数: 450 000

定价: 1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鬲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

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她）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她）们放大胆子去写，因此他（她）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她）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她）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与曹伟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榕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青铜酒器器类演变的差异性研究^{*}

——从青铜斚谈起（代序）

张懋镕

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演变轨迹，通常的表述是：从夏代开始出现，进入商代之后发展迅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在商代晚期形成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而第二个高峰期则在春秋晚期，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作为青铜酒器，演变轨迹似乎也应该如此。问题是具体到每一类酒器，发展演变的轨迹也是如此吗？

数年前，吴伟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青铜斚整理与研究》^[1]，而今又经修改后出版专著（以下简称《吴著》）。在初稿中吴伟认为青铜斚发展的高峰期在商代中期。一开始，我对此表示怀疑。商代晚期是商人“重酒”即酒器盛行的时期，按理说作为商代酒器中的重要类别——青铜斚，它的繁盛期似乎只能在商代晚期，怎么会在商代中期呢？近来在看另一位研究生裴书研的硕士学位论文《商周青铜壶研究》^[2]，也涉及相似的问题，裴书研得出的结论是：青铜壶的第一个高峰期并不在商代晚期，而是在西周早期。开始我也不大相信。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事给我提了个醒：所谓商代晚期是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的说法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到各类酒器，则各有差别，不能一概而论之。情况究竟如何，下面还是先从青铜斚说起。

附带说明一点，本文是在我所指导的多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她）们对于各类酒器的发展轨迹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凡是相同的论说，我尽可能不去重复，请读者去看他（她）们的论文。他（她）们没有谈到或者强调不够的地方或者有争议的问题，乃是我论述的重点。关于如何衡量一类青铜酒器发展的状态，以往的研究十分强调铸造的精美程度，纹饰的繁复华丽程度，这是正确的，但是窃以为还不是最主要的。度量的尺子主要有两把，一是器物的数量，二是器物的高度。至于纹饰的繁缛还是简约，那是我们现在的自我感觉，未必能代表古人的审美情趣，一味地推崇商器的华丽，排斥周器的简约，很难说是恰当的评判标准。另外本文关于各类青铜酒器的分期不追求细致，勾勒粗线条或许更能展现它们起伏演变的状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夏商周青铜礼器的兴衰及其原因》（立项号15BKG007）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一、关于青铜罍高峰期的讨论

《吴著》已经对青铜罍的资料作了很好的整理，为了更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们在《吴著》的基础上补作了表一。

表一 青铜罍数量统计表

朝代	分期	出土数量（件）	传世数量（件）	小计（件）	百分比
夏代晚期商代早期早段	一期早段	15	8	23	5.85%
商代早期晚段	一期晚段	49	12	61	15.52%
商代中期	二期	65	23	88	22.39%
商代晚期早段	三期早段	53	67	120	30.53%
商代晚期晚段	三期晚段	40	24	64	16.28%
西周早期	四期	18	19	37	9.41%
总计		240	153	393	

考虑到仅仅从数量还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青铜罍的发展轨迹，尚需要考察各个期别青铜罍的质量，质量主要表现在体量方面，于是我们在《吴著》的基础上收集出土青铜罍的通高数据，又补作了表二。

表二 出土青铜罍通高统计表

朝代	分期	20厘米以下	20~29厘米	30~39厘米	40~49厘米	50~59厘米	60~69厘米	70~79厘米	小计
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早段	一期早段		13	1					14
商代早期晚段	一期晚段	1	41	4					46
商代中期	二期	3	39	11	2				55
商代晚期早段	三期早段	1	14	14	6	2	10	2	49
商代晚期晚段	三期晚段	7	15	14	3				39
西周早期	四期	1	3	12					16
总计		13	125	56	11	2	10	2	219

通过以上两份表格，或许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青铜罍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第一，从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早段，青铜罍数量有23件，虽然只占总数的5.85%，但比起同时期青铜壶只有区区几件而言，数量还是不少（详后）。青铜罍自诞生开始，就是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成员。而且此时青铜罍的通高均在20厘米以上，要比同出的其他青铜酒器如爵、盃等高很多。这些都为青铜罍能在以后的发展阶段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于青铜罍来说，商代早期晚段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总量从23件增加到61件，翻了一倍多，尤其是出土量从15件增加到49件，翻了两倍多。商代早期早段通高超过20厘米的有14件，超过30厘米的1件，而商代早期晚段通高超过20厘米的就有45件，超过30厘米的有4件，同样翻了两倍多。为商代中期青铜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商代中期确实是青铜罍大发展的时期。出土青铜罍的数量为65件，不仅远超前代早期晚段的49件，也比商代晚期早段的53件要多。至于传世青铜罍只有23件，远逊于商代晚期早段的67件，是有原因的。一是由于传统金石学对铭文的偏爱，从北宋到民国，商代晚期早段有铭文的青铜罍得以较多地保存下来，而缺少铭文的商代中期青铜罍被更多地抛弃了；二是商代晚期早段青铜罍比商代中期青铜罍厚重，纹饰也比较华丽，深受公私藏家的喜爱，因此得以更多地保存下来。如今我们看到的商代中期与商代晚期早段的传世青铜罍的数量比率是失衡的，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两个时期的青铜罍的发展态势时，主要观察出土青铜罍的数量与质量，同时酌情参考传世青铜罍。

第四，商代中期确实是青铜罍大发展的时期，但是能不能称之为高峰期呢？不妨先和商代晚期早段做一比较。

商代晚期早段的青铜罍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是数量多，总数120件，超过商代中期的88件。其次是出土青铜罍高度在50~59厘米的有2件，60~69厘米有10件，70~79厘米有2件，而商代中期的出土青铜罍没有一件达到50厘米。超过50厘米就算大型青铜器，这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另外，在这一阶段的墓葬中，开始出现形制、纹饰、铭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两件一对的青铜罍。就好比壶以对壶的形式出现墓葬中，标志着壶在酒器组合中的强势地位，同样对罍的出现，有效地排斥其他酒器，尤其那么宏伟的一对青铜罍耸立在那里，无疑加重了青铜罍在墓葬出土酒器组合中的分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这一阶段方罍的出现。如同方鼎在墓葬中的地位一样，方罍的出现也标志着墓主人级别很高。对罍与方罍的例子有：①其罍（《商周》10893）与亚其罍（《商周》10950），通高分别为61.8、61.2厘米，口径分别为29.2、29.3厘米，重量分别为15.5、14.7千克，除铭文稍异，形制、纹饰一致，应为一对。②妇好方罍一对（《商周》10956-57），通高分别为67与68.8厘米。③后巧母大圆罍一对（《商周》11018-19），通高分别为66.5与65.7厘米。这三对青铜罍，包括其中一对

青铜方罍均出土在武丁配偶妇好墓中，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青铜罍超越前代的气魄与魅力。

以上分析可见，商代晚期早段的青铜罍，在各个方面超越商代中期。况且商代中期在200年左右，商代晚期早段只有100年左右，所以要论高峰期，非商代晚期早段莫属。关于这一点，最近我与吴伟商量，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对书稿作了修改。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正是经过一番探讨，才使我认识到，不能笼统地说商代晚期是青铜罍的高峰期，因为从表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到了商代晚期晚段，青铜罍开始走下坡路，总数只有64件，几乎只有商代晚期早段的一半，而且再没有出现像妇好墓出土青铜罍那样的宏伟器物了。准确地说，商代晚期早段即殷墟一、二期才是青铜罍的高峰期。当然商代中期青铜罍的蓬勃发展是很好的助推力，值得我们关注。

二、青铜壶的发展轨迹

关于青铜壶的发展轨迹，我已经在为裴书研著作《商周青铜壶整理与研究》所写的序言《在酒器中，青铜壶一枝独秀》中作了论证，为了说明问题，现将有关要点转述如下：（这里省略了原文中的表格）

依据青铜壶的发展态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商代早期到西周早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青铜壶多出在墓室面积在4平方米以上的墓葬中，表明青铜壶在出现伊始，就不是一般的酒器，中级及其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使用，而且级别越高，使用的壶的数量越多。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青铜壶的特质非常重要。

从商代早期到西周早期，壶的数量在逐渐增加。西周早期出土的青铜壶有42件，比整个商代晚期的出土数量38件还要多。西周早期出土的青铜壶有两件通高超过60厘米，与商代晚期早段的情况相当，比商代晚期晚段要强。虽然西周早期缺乏通高50~59厘米的出土青铜壶，但是通高40~49厘米的有8件，而商代晚期早段没有一件，晚段也只有2件。通高在30~39厘米的出土青铜壶，西周早期也比商代晚期要多。在传世青铜壶中，西周早期虽然没有通高超过50厘米的壶，但是通高40~49厘米的有9件，相当于商代晚期早段与晚段的总和。鉴于西周早期的实际年数不及商代晚期的一半，所以这些数据是令人吃惊的。以往我们常说商代晚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但具体到青铜壶，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商代晚期的青铜壶除了在精致方面或略占优势以外，在数量与体量方面均不会超出西周早期。或许我们可以说西周早期才是青铜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开始出现形制、纹饰、铭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两件一对的青铜壶。譬如：妇好壶2件（《商周》11999-12000），通高50.9厘米。后巧母方壶2件（《商周》12031-32），通高分别为64.4与64厘米。这两对青铜壶都是1976年安阳小屯

M5出土的。西周早期也有对壶，如师卫父壶2件（《商周》12402-03），通高31厘米，2010年见于西安，传山西出土。青铜壶以两件一对的形式出现，无疑加重了青铜壶在墓葬出土酒器组合中的分量，这为青铜壶日后取代其他酒器而一枝独秀积累了资本，奠定了基础。

青铜壶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进入西周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数量突然锐减，分别为95和94，只有早期148件的64%。可见，虽然青铜壶不像其他酒器遭遇灭顶之灾，但是数量的减少，仍然说明在周人禁止酗酒的政策影响下，青铜壶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我们以前不太了解的情况。不过从出土青铜壶的数量来说，西周中晚期与西周早期分别为：40、47、42，差别不大。西周中晚期青铜壶的数量虽然明显少于西周早期，但是出现多件通高超过50乃至60厘米的大型青铜壶，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西周中晚期是青铜壶发展的低谷。

通常认为春秋早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低谷时期，然而看看春秋早期的青铜壶，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就出土数量而言，春秋早期的青铜壶是115件，比西周中期的40件与西周晚期的47件之和还要多。在我们所划分的11个期别中，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总量，春秋早期都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就通高而言，春秋早期在40~49、50~59、60~69厘米的出土物也要比西周中、晚期多。而且在传世器中，首次出现超过70厘米的大型青铜壶。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一阶段的方壶很多，占总量的54.8%。如同方鼎在墓葬中的地位一样，方壶的出现也标志墓主人级别很高。方壶的主人晋侯燹马、晋侯听、晋叔家父、陈侯、鲁侯、秦公、虢季、芮公、曾仲旂父、贾伯是诸侯国的国君，仲姜是国君夫人，周芻、射、彘、匄车父、矩叔、单五父等人的身份从壶的高度（大致在48~58厘米之间）以及出土单位、铭文内容来分析也是地位很高的贵族。

很多方壶成双成对，也是对壶，对壶或者可以称之为列壶，将它与单壶相比较，意义是不同的。就好比鼎以列鼎的形式出现墓葬中，标志着鼎在饪食器组合中的强势地位，同样对壶的大量出现，有效地排斥其他酒器，尤其那么宏伟的一对酒壶耸立在那里，其地位不言而喻。如果说在第一阶段，青铜壶只是青铜器组合中的一个有分量的参与者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青铜壶已经确立了它作为酒器的代言者地位。

青铜壶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春秋中期——战国晚期。

对于青铜壶来说，春秋中期是发展的一个低谷期，数量少，出土物只有55件，不到春秋早期的一半。如果从通高来看，春秋中期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阶段。首次出现多件通高超过80、90厘米的大型青铜壶，甚至在一个墓葬中出土了7件形制、纹饰、铭文相同的壶（1977年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村M1出土），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到来。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壶的数量在节节攀升。尤其是春秋晚期出土了通高超过100厘米的莲鹤方壶，且铸造精良，表明青铜壶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形制、纹饰、铭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对壶依然很多，有10批，其中方壶有3批。在方壶中，蔡侯申是诸侯国的国君，十四年方壶的主人是中山王国的国君，曾姬无卣是楚国国君夫人，主人身份均显赫。另外圆壶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曾侯乙是诸侯国的国君，洹子孟姜是齐国重臣田桓子的夫人，赵孟夙是晋国正卿，地位很高。左使车壶出在中山王国国君的墓中，也非寻常之物。

总而言之，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青铜壶不仅始终是酒器组合中的核心，也一直是各个历史阶段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青铜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期：西周早期、春秋早期、春秋晚期，但总的来说发展的轨迹起伏不大，相对比较平稳，发展势头十足，显示出青铜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他酒器有很大差别。

三、青铜觥的发展态势

四年前刘莹莹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商周青铜觥的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刘文》）^{〔3〕}，本节在《刘文》的基础上，对一些青铜觥的年代作了调整，期别也有所变化，补作了一个表三（没有图像的不在计算之内）。

表三 出土与传世青铜觥统计表

朝代	分期	出土数量（件）	传世数量（件）	小计（件）	百分比
商代晚期	第一期	13	7	20	21.74%
商代晚期	第二期	5	5	10	10.87%
商代晚期	第三期	8	22	30	32.61%
西周早期	第四期	17	14	31	33.70%
西周中期	第五期	1		1	1.09%
总计		44	48	92	

与青铜罍、壶不同，青铜觥从殷墟二期才问世，而且流行时间不长，到西周中期以后就消失了。然而青铜觥从一开始出现就因制作精美、纹饰华丽而惊艳天下。本节将青铜觥的发展历程分为五期。

第一期即是殷墟二期。该期有出土器13件，传世器7件，小计20件，占青铜觥总数的五分之一强。数量比后来的殷墟三期还要多，其中商王妃妇好的墓中就出土8件，这是非常特别的情况，很可能在表示青铜觥就是为了高级别的贵族定做的，它出现伊始就受到统治阶级的格外青睐。此时青铜觥形制有三足、四足、圈足，已经具备了日后青铜觥的主要型式。值得注意的是，已出现成双成对的觥，譬如妇好墓出土8件觥，分为四对，司母辛四足觥两件（《商周》13623-24），妇好圈足觥2件（《商周》13608-09），虺纽觥2件，残觥2件，每一对觥的形制、纹饰、尺寸都一样，而它们彼此之间则有区分。可见青铜觥一登场起点就很高，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发展态势。也正因为如

此，我们不能轻易就说殷墟二期是青铜觥发展的高峰期。

第二期即为殷墟三期。这一时期有出土器5件，传世5件，小计10件，明显比殷墟二期数量要少。而且在形制与装饰方面只是承绪殷墟二期的风格，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

第三期相当于殷墟四期。这个时期青铜觥有几点看点。第一，数量多，出土器8件，传世22器件，小计30件，几乎占到青铜觥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与西周早期相伯仲，但考虑到殷墟四期的实际年数大大少于西周早期，所以殷墟四期无疑是青铜觥数量最多的时期。第二，满花、三层装饰的青铜觥很多，占到这一时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试看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与日本藤田美术馆藏的两件殷墟四期的鸟兽觥，通体布满花纹，而且层次十分丰富，装饰之繁缛与华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三，扉棱得到广泛使用。装饰扉棱的青铜觥数量超过没有扉棱者，使器物的立体感很强，显得更为宏大、挺拔。第四，方体觥大量涌现，不少于9件，占这一时期总数的30%左右。方觥如同方鼎、方壶一样，只有级别很高的贵族才能拥有它。譬如山东青州苏埠屯就出了多件方体青铜觥，其主人是一方诸侯。总而言之，殷墟四期应为青铜觥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至于为什么殷墟四期的传世觥数量远远超过出土觥，一是这一时期铭文增加，二是形制特别、纹饰精美，这两点都是公私藏家的钟爱之处。

说殷墟四期是青铜觥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西周早期的青铜觥数量与殷墟四期差不多。按说随着周初禁止酗酒的政策的推行，很多酒器器类的数量大减甚至消失，而青铜觥却几乎不受影响，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青铜觥在殷墟四期发展势头迅猛，到了西周早期依然余威不减。

第四期相当于西周早期。此时青铜觥数量很多，与殷墟四期差不多，型式也多样，有方体觥、圈足觥等，而且方体觥的数量也不少。另外还有新的创造，譬如告田觥，在觥下设置一个方座，这种型式的觥未见于商代晚期。就装饰而言，从繁缛向简约转变，有地纹和满花的青铜觥减少了。但仍然有折觥那样器物厚重、纹饰繁复、华美的器物，以至于现在还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周初器物（殷商韵味浓郁），不相信会晚到周昭王时期。可能因为青铜觥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而西周早期的禁止酗酒的政策在高级贵族那里收效还是有限，所以这一时期的青铜觥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数量。

第五期即西周中期。此时青铜觥突然锐减，只剩下一、二件。这应该与周人长期以来坚持推行禁止酗酒的政策有关。但即便处于衰亡阶段，像日己方觥这样的器物仍然保持着较大的体量和满身的纹饰。

《刘文》已经正确指出殷墟四期是青铜觥的高峰期。这意味着青铜觥的发展态势与前面所说青铜罍、青铜壶是不同的。

四、青铜方彝的发展态势

青铜方彝与青铜觥的发展历程比较接近，也是从殷墟二期才问世，主要流行到西周中期。不同的是青铜方彝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还有，但多为明器。本节在李娟利论文《商周方彝的整理与研究》（下简称《李文》）的基础上^[4]，对一些青铜方彝的年代作了调整，补作了一个表四（没有图像的不在计算之内）。

表四 出土与传世青铜方彝统计表

朝代	分期	出土数量（件）	传世数量（件）	小计（件）	百分比
商代晚期	第一期	13	19	32	23.70%
商代晚期	第二期	2	13	15	11.11%
商代晚期	第三期	4	22	26	19.26%
西周早期	第四期	4	15	19	14.07%
西周中期	第五期	6	9	15	11.11%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第六期	26	2	28	20.74%
总计		55	80	135	

对于青铜觥来说，器物的高度不是衡量的标准之一，因为绝大部分青铜觥的高度在十几到二十几厘米之间，但是对于青铜方彝来说，器物的高度则是主要的影响因子，所以我们在《李文》的基础上收集了青铜方彝的通高数据（表五、表六）。

表五 出土青铜方彝通高统计表

朝代	分期	10厘米以下	10~19厘米	20~29厘米	30~39厘米	40~49厘米	50~59厘米	60~69厘米	小计
商代晚期	第一期		1	6	2			1	10
商代晚期	第二期			2					2
商代晚期	第三期			1	1				2
西周早期	第四期				1	2			3
西周中期	第五期		2	1	1				4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第六期	2	15	2	1	1			21
总计		2	18	12	6	3		1	42

表六 传世青铜方彝通高统计表

朝代	分期	20厘米以下	20~29 厘米	30~39 厘米	40~49 厘米	小计
商代晚期	第一期	6	10			16
商代晚期	第二期	2	8	1		11
商代晚期	第三期	1	15	1		17
西周早期	第四期	1	5	2	1	9
西周中期	第五期	2	2			4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第六期	1	1			2
总计		13	41	4	1	59

本节将青铜方彝的发展历程分为五期。一期相当于殷墟二期。与前述青铜觥的初始阶段相似，方彝从一开始出现就制作精美、纹饰华丽，发展极为迅猛，有很多后世不能企及的优长之处。首先是数量多，共计32件，超过后来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其次是在妇好墓中出土似两件方彝连在一起的所谓偶方彝，这是唯一的1件偶方彝，而且通高达60厘米，重71千克，也是商代最大最重的1件方彝，弥足珍贵。偶方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在妇好墓中已经有成双成对的方彝。如妇好方彝2件（《商周》13493-94），形制、纹饰、铭文以及大小都一样。在传世器中也有，如冉方彝2件（《商周》13466-67），形制、纹饰、铭文以及大小都一样。在一类器物的发展的初级阶段就有如此成熟的表现，是很少见的。再次，如《李文》所分析的，殷墟二期时方彝有多种不同的型式，可以说后来的方彝只是作了一些局部改变而已。

第二期相当于殷墟三期。相对于第一期来说，第二期不仅数量少，只有第一期的一半，质量上也没有什么胜出之处。

第三期相当于殷墟四期。这一时期的青铜方彝相比殷墟三期有很多优长之处，可以说直接继承了殷墟二期特点。首先是数量多，有26件青铜方彝，接近殷墟二期的数量。其次，从通高而言，总体上殷墟四期超出殷墟二期。殷墟二期毕竟是方彝的起步阶段，所以还有7件20厘米以下的小型器，而殷墟四期只有一件。20~29厘米的方彝，殷墟二期有16件，殷墟四期也有16件，30~39厘米的方彝，殷墟二期有2件，而殷墟四期也有2件，旗鼓相当。就成对的铭文方彝而言，殷墟二期有2对，而殷墟四期有4对：戈方彝（《商周》13468-69）2件，形制、纹饰、铭文都一样，唯大小差1厘米；亚醜方彝2件（《商周》13485-86）、告永方彝2件（《商周》13523-24）、亚若癸方彝2件（《商周》13531-32），形制、纹饰、铭文以及尺寸都一样。

《李文》说晚商是青铜方彝的发展高峰期，是对的，具体而言，应在殷墟二期与殷墟四期。之所以说殷墟四期也是青铜方彝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西周早期的青铜方彝的数量与殷墟四期差不多。这种现象也见于青铜觥，如前所言。

在西周早期，很多酒器器类的数量大减甚至消失，而青铜方彝受的影响不太大，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青铜方彝在殷墟四期发展良好，到了西周早期依然受到庇荫而发挥着作用。

第四期相当于西周早期，此时方彝数量虽然有时减少，但仍有19件，而且出现3件通高超过40厘米的大方彝，其中一件四出戟方彝通高49.1厘米，接近50厘米，着实让人刮目相看。还有像令方彝、叔牝方彝、荣子方彝、折方彝那样比较华丽的方彝。这几件方彝的年代，学者们多认为属昭王时期，但还有人坚持它们是周初之物，原因就在于太像商代晚期的方彝，不但器物厚重，而且“满花”三层，制作精美。

第五期相当于西周中期。数量也不少，有15件之多，可见方彝虽然从西周早期开始自顶峰滑落，但衰减的步伐较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而且形制上也有新变化，如井叔方彝、盞方彝、师遽方彝，双耳作象鼻形，富有特色。在器体上，也还算较高大，通高多在28厘米以上，装饰以兽面纹为主。此时明器方彝出现，标志方彝开始衰退，这当然与周人禁止酗酒以及“穆王革典”有关。

第六期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一阶段的方彝大多数是明器，器体矮小，制作粗糙，纹饰简单或者素面，有些方彝盖和器体连铸，腹腔内还存有范土。

总而言之，青铜方彝与青铜觥相似，一开始发展就很迅猛，在西周酒器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它们依然有一段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这一点既与青铜壶不同，也和青铜罍相异。

五、青铜觥的发展态势

曹斌的硕士学位论文《商周青铜觥研究》指出他所划分的第二期即殷墟四期是青铜觥的兴盛期^[5]，第三期即西周早期是青铜觥的繁荣期，大致不错。原文没有出土青铜觥数量统计表和通高统计表，今根据《曹文》提供的数据增补如表七、表八：

表七 出土青铜觥数量统计表

朝代	分期	出土数量（件）	百分比
商代晚期偏早	第一期（殷墟二、三期）	8	4.85%
商代晚期偏晚	第二期（殷墟四期）	46	27.88%
西周早期	第三期	80	48.48%
西周中期	第四期	19	11.52%
西周晚期	第五期	12	7.27%
总计		165	

表八 出土青铜觶通高统计表

朝代	分期	10厘米 以下	10~14 厘米	15~20 厘米	20~30 厘米	小计
商代晚期偏早	一期（殷墟二、三期）		2	5		7
商代晚期偏晚	二期（殷墟四期）	1	30	15		46
西周早期	三期	3	41	26	1	71
西周中期	四期		2	12	3	17
西周晚期	五期	2	8	3		13
总计		6	83	61	4	154

依据《曹文》将青铜觶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相当于殷墟二、三期。青铜觶从殷墟二期开始问世，到殷墟三期共出土8件，数量不多，与青铜觥与方彝初始期的表现完全不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形体比较高，没有10厘米以下的器物。高度15~20厘米的青铜觶所占比例较大。

第二期即殷墟四期，对青铜罍与壶来说是低谷期，对青铜觶来说却是重要的发展时期。青铜觶数量从8件一下增加到46件，占青铜觶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是殷墟二、三期总和的5倍多，令人瞩目。15厘米到20厘米的青铜觶数量也很多。《曹文》称之为青铜觶的“兴盛期”。

第三期即西周早期。出土青铜觶的数量为80件，几乎占青铜觶总数的一半，同时也比“兴盛期”的第二期要多出42.5%。同时出现20厘米以上的青铜觶。《曹文》称这一时期为“繁荣期”。我们认为相比商代晚期来说，西周早期才是青铜觶的高峰期。高峰期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对觶的出现。如传世器伯旂觶1对（《商周》10604-05），朕觶1对（《商周》10613-14），1966年洛阳北窑村庞家沟墓地418号墓出土的彝觶1对（《商周》10607-08），据传出土于洛阳的齐史遯觶1对（《商周》10643-44），以上器物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尺寸也十分接近。大部分对觶出现在西周早期，显示出此时青铜觶在青铜器组合中的强势地位。

第四期即西周中期，数量大减，出土青铜觶只有17件，占总数的10%多一点，显然青铜觶在走向衰落。即便如此，也有一些亮点。譬如20厘米以上的青铜觶有3件，超越其他时期；也有对觶，如员觶1对（《商周》10567-68）；铭文最长的青铜觶也在这一阶段，如趯觶（《商周》10659）铭文69字。

第五期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以素面器和明器为多，所以高度也普遍降低。

总而言之，青铜觶出现时间比罍、壶要晚，比觥、方彝稍早，高峰期与青铜壶重叠，在西周早期，衰落时间与觥相近，在西周中晚期。